

从汉晋行政区划看诸葛亮躬耕地

□石小生

最近，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又起纷争。本来，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悬案，争争无妨，但由于这次的争论不同寻常，有误导后人之嫌，故笔者也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辨，以还历史真相。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在其《出师表》中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人对这句话有两种解法，一是认为此“南阳”就是当时的宛城，即今天的南阳市区。因为诸葛亮本人及《三国志》中从未提及“躬耕于隆中、躬耕于襄阳”的话语。二是认为这个“南阳”指的是隆中，主要理由有四：1. 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2. 诸葛亮躬耕于邓县，邓县归襄阳郡管辖；3. 宛县为曹魏集团占领，刘备不可能前往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4. 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许多名士师友，他的亲属也全都居住于襄阳。这些观点最后发展到了对南阳这样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襄阳一带。”“南阳，地名，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以至于武断地

说，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希望不要再争论下去了。

我们认为，“襄阳说”的主要理由之一“历代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一致的”这个理由本身就不准确，《后汉书》、《三国志》并没有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的任何记载，只是《三国志》问世百余年后，东晋襄阳人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说：“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之后才以讹传讹形成了襄阳说的主要观点。这也是目前“襄阳”、“南阳”两说学者纷争的主要起因。所以，我们今天重辨这个问题时，应排除汉晋以后相关此事所有有争议的观点，让历史回归到《后汉书》、《三国志》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后世两说均认可的史料中去，根据其行政区划的沿革，分辨南阳究竟是指何处。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

1. 东汉末年，即诸葛亮躬耕南阳时今隆中是否属南阳郡？《后汉书》记载的阿头山是否今日襄阳的隆山或万山？

东汉时，行政区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南阳郡、南郡均属荆州。《后汉书·郡

国四》载：南阳郡，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雒、鲁阳、犍、堵阳、博望、舞阳、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育阳、涅阳、阴、鄧、山都、郦、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成都、襄乡、南乡、丹水、析 37 县。南郡辖江陵、巫、秭归、中庐、编、当阳、华容、襄阳、郢、宜城、郡、临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等 17 县。南阳郡、南郡隔汉水相望。张衡的《南都赋》云：“陪京之南，居汉之阳”，指的就是南阳郡的地理状况，也是南阳名称的来历。就连提出隆中说的襄阳人习凿齿在《襄阳记》中也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襄阳县志》载：襄阳，西汉初年建县，“辖汉水以南，郢县以北，中庐县以东，属荆州刺史部南郡”。古隆中位于襄阳县城西 20 余里，居汉水之南。江北，即今樊城一带，为古邓县，“辖汉水以北，新野县以南，襄阳县以西，山都县以东的地区，属南阳郡”。而在《后汉书·郡国四》的南郡条下，南郡辖 17 城，襄阳是其一，书载“襄阳有阿头山”。今襄阳城西无阿头山之名，只有万山即隆中山，隆山是阿头山的后起之名，隆中即隆山之中。可见，此时的襄阳县不属南阳郡，而今隆中在汉江南岸的襄阳县阿头山。

我们从《三国志》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隆中这个地名，同样也找不到阿头山属南阳郡管辖的任何史料。而隆中一词最早出现是东晋的《汉晋春秋》。至于“襄阳无西”，“南阳郡邓（城）县与南郡之襄

阳县是以襄阳城西十一里之万山划界”的说法，则是后人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志》的郡县分界推演出来的，这些后世的史料目前均无法推翻“襄阳有阿头山”之史实。

从地图上看，汉水是由西北偏北的方向向东南偏南的方向汇入长江的，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其东西走向只有从山都至襄阳约百公里的一段，而南郡和南阳郡的划分也只有这一段史书上讲的最为清楚，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

2. 诸葛亮写《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今隆中地区此时划归何处？

由于行政区划经常变化，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一个习惯，即追述历史时，除必要时引用古地名外，一般均是用著书时的地名注明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点《三国志》的作者也不例外。三国蜀建兴五年（227 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出师表》；而此前建安十三年（208 年）八月，曹操攻占南郡北部，设襄阳郡，“统县八”，管辖南郡的襄阳、中庐、郢县、宜城、鄧县、临沮及原南阳郡的山都、邓县。而刘备南征江南四郡后，也在江北设立过襄阳郡，委任关羽为襄阳太守。尽管关羽并没有走马上任，但在刘备及诸葛亮的心目中，襄阳的军事地理位置如此重要，设郡也是迟早的问题。既然襄阳 20 多年前已升格为与南阳郡平行的地位，按常理，20 年后，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再将襄阳城外的隆中说成是南阳，就不合情理了，这一点，在《三国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如马良，187 年生，宜城人，时宜城属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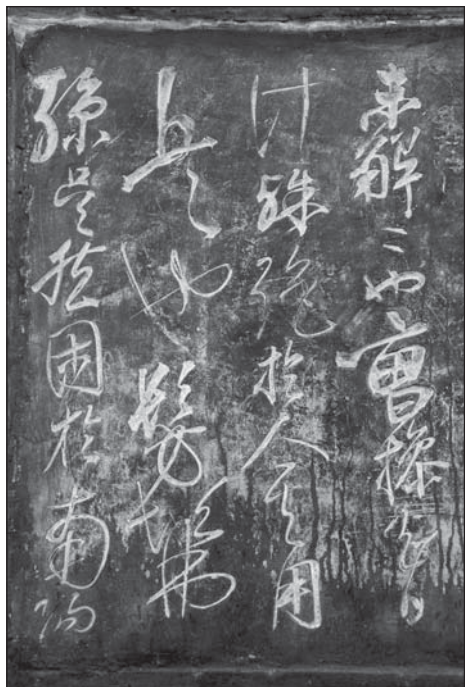
郡，而到建安中（马良应已20岁以上），宜城改属襄阳郡，故《三国志·蜀书·马良传》云：“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

古人籍贯，向以郡望为主，即郡在前，县在后，郡治地也可以只书郡。上述传记表明，在这一时期，襄阳和南阳是对等的，都是郡，同时，邓县此时属襄阳郡，不论今隆中是否属邓县，在此阶段，在诸葛亮和陈寿的心目中，已升格为郡且管辖着隆中地区的襄阳绝对不可能和同为郡的南阳混为一谈。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阳画上等号。

3. 陈寿著《三国志》时用的地名，是何时的区划？

陈寿（233~297年）写《三国志》为西晋泰始十年（274年）前后，距诸葛亮躬耕南阳（建安二年至十年，即197~205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的区划，必然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通观全志，陈寿用的基本是西晋初年的区划和地名。而在晋太康年间（280~289年），晋武帝分南阳郡南部的今新野、邓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枣阳、随州等县设立义阳郡，治所新野。又将建安十三年划归襄阳郡的古邓县分置邓城县，辖今樊城一带，归襄阳郡，邓县则归义阳郡。分南阳郡西南的今西峡、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县、老河口一带设南乡郡。加上原先已设的襄阳郡，《晋书·地理志》所载如下：“襄阳郡，魏置。统县八，户二万二千七百。宜城、中庐、临沮、郢、襄阳、山都、邓城、鄆（其中邓城县为新置）。南阳国，秦置郡。统县十四，户二万四千四

百。宛、西鄂、雒、鲁阳、犍、清阳、博望、堵阳、叶、舞阴、比阳、涅阳、冠军、酃。顺阳郡，太康中置。统八县，户二万一百。鄧、顺阳、南乡、丹水、武当、阴、筑阳、析。义阳郡，太康中置。统县十二，户一万九千。新野、穰、邓、蔡阳、随、安昌、棘阳、厥西、平氏、义阳、平林、朝阳。”于是，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的三国时期的许多人物籍贯，均是以晋初的行政区划标注的。如：“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在东汉末年属南阳郡的新野，在标注人物籍贯时，陈寿从未用东汉三国时期的区划标明为“南阳新野人”。而在《后汉书》中的新野人士均注明为“南阳新野人”。由此可见，陈寿以及习凿齿都是以西晋初的行政区划来标注三国时期的事件发生地和人物的身份的，而不是用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既然此时期的南阳郡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只辖冠军、清阳、比阳以北的十几个县，连今天的邓州、唐河、新野都不辖了，同时和襄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和顺阳郡，那么，将襄阳和南阳混为一谈更是匪夷所思了。退一步讲，现有争议的今隆中地区即便时属邓县或邓城县、山都县，区划也都在襄阳郡和义阳郡，那么，今隆中也应随当时的区划为“义阳邓县”或“襄阳邓城”、“襄阳山都”，而绝不会是南阳。如果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陈寿能对《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这样与当时行政区划明显不符的错误记述视而不见吗？对前史中因行政区划变动而产生名



岳飞手书诸葛亮《后出师表》手迹

称、归属变化的地名进行必要的注释，是史学家的基本常识。依陈寿这样著名史学家的水准，是不会犯这样的遗漏的。事实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陈寿认为“南阳”就是南阳，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没必要再注释。

4. 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南阳能否指宛城？

的确，在东汉三国时，南阳是一个郡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将州、郡、县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名称屡见不鲜。如《汉书·地理志》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莽曰南阳。”自此以后，南阳既指南阳郡，也指宛城。《后汉书·天文志上》：“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印、王常及更始

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都是宛城。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后汉书·孝安帝纪》中记载，延光四年三月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同样，南阳与宛城以及襄阳与州治荆州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中也非常普遍。

与此相类同的是，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吴书》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吕）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依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南郡等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

在上述记述中，作为郡名的南阳、南郡等常与具体的属地县名并列使用，所以，在事件行文的记述中，大量郡名的使用已不是泛指整个郡境，而是具体指郡治所在地。如前文中所引汉安帝病、崩史料就足以说明问题。

5. 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南阳，是指宛城无疑。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

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蜀汉建兴五年（227年）所作，《后出师表》为蜀汉建兴六年（228年）所作，前后仅差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应该指的是宛城。

“襄阳说”要否定《前出师表》“躬耕南阳”中的南阳是宛城，就必须首先否定《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也是宛城，否定《后出师表》，否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千古名言。否则，前后出师表中的“南阳”之记载在“襄阳说”中的矛盾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6. 假设今天的隆中地属南阳郡邓县，那么在《三国志》中是否有可能以南阳代替，或暗指呢？在诸葛亮眼里，近在咫尺的襄阳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按一般的习惯，生活在大城市辖区内的边远小县的人对外声明自己的居住地时，可以只说大城市名或大行政区名。但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并非边远小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襄阳就有“楚之北津戍”之名。上通秦陇，下控汉沔，东瞰吴越，西望川陕，历来为“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的南船北马交接之地。东汉灵帝崩，刘表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治所由汉寿移至襄阳。从此，襄阳地位愈加重要。刘表利用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在《三国志》中，凡是关于襄阳的记载都

非常明确。如《三国志·魏书·满田牵郭传》：“关羽围襄阳，（满）宠助征南将军曹仁屯樊城拒之。”《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周瑜在病危之际给孙权的遗书中提出了“规定巴蜀，次取襄阳”的战略计划，襄阳地位与巴郡相等，是周瑜计划在汉江以南与已占领南阳的曹操相抗衡的两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三国志》中，连襄阳、樊城距离这么近的城市都分得清清楚楚，襄阳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怎么可能到了诸葛亮手里就讲不清了？不提近在咫尺的襄阳，而非要去附会200余里外的南阳？难道他对曾经生活了数年的襄阳城无动于衷吗？笔者认为诸葛亮不是对襄阳没有感情，那里毕竟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确实不在那里，只能提南阳而已。

7. 习凿齿并未说过隆中是诸葛亮的躬耕地或三顾草庐之地，只是说隆中是诸葛亮的家、故宅。

我们不能否认，习凿齿（？～383年）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所著的《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史书记载了大量不载正史的史料，补充了《三国志》史料的许多缺失和简略。同时，他也是迄今距三国时期时间最近的史学家。他在《汉晋春秋》中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另外，《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记载，他从襄阳太守任上回襄阳后，给桓温弟秘信中说：“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遗事犹存，星列满目。”正是这些记载，引发了“襄阳”、“南阳”两

说的争论。后来,《水经注》、《三国演义》等根据他的记载,逐步演变成“躬耕隆中”、“隆中对”等。

习凿齿虽晚于诸葛亮150余年,毕竟是东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对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之。首先,他肯定了“自汉以南为南郡,汉以北为南阳郡”。他曾专程去隆中凭吊孔明故宅,并写了《诸葛武侯宅铭》,记叙了孔明故宅的情景,论述了孔明志在复兴汉室、统一中原大业的抱负,颂扬了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在他的著作中,还收录了孔明的《后出师表》,对考证此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里,后人留下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习凿齿关于诸葛亮故居的记载,可以发现均没有“草庐”、“三顾”这样的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诸葛亮确实在襄阳生活过很长时间,大约在兴平二年(195年),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一起随叔父诸葛玄投奔刘表,首先到的就是襄阳,在此与许多名士游学往来,并在襄阳娶妻黄氏。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故,诸葛亮不愿意依附刘表,便与弟诸葛均又躬耕于南阳。在襄阳隆中期间,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主要也是躬耕,同到南阳以后一样,因为在当时许多未入仕的名士中,这种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隆中是诸葛亮在襄阳的家,是故宅;南阳卧龙岗是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其弟不

愿依附刘表而重新寻找的躬耕之地。《大明一统志》把两者的关系讲得最为准确:“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这样,习凿齿的“亮家于隆中”与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就很容易解释了。

结论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江为界,襄阳与隆中均在江南,不属南阳。同时,襄阳时为荆州治所,水陆码头,按人们一般习惯,总是会将距自己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作为自己生活居住地的代表地,所以居住在襄阳的人没必要去附会200里之外的南阳。20余年后诸葛亮上前、后《出师表》时,曹魏已设襄阳郡,南郡、襄阳郡、南阳郡三郡泾渭分明,隆中已属襄阳郡。再50年后,陈寿著《三国志》时,西晋又在南阳郡和襄阳郡之间设立了义阳郡和顺阳郡,西晋时的南阳郡范围很小,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南阳市区及周边几个县了。所以,《出师表》中提到的“躬耕于南阳”,从西晋以前的史料来看,所指的只能是今南阳城区一带,最起码,我们从《三国志》本身以及此前的史书中很容易就能找出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南阳是指宛城的旁证,但却找不到一条今隆中地区能以“南阳”代替的旁证。从这个角度看,隆中当时是否属于邓县,习凿齿以后的史书怎么记载,都是无足轻重的了。只要“躬耕于南阳”这句话不被否定,诸葛亮躬耕地和刘备的三顾地在宛城就是可以确定的了。